



制图王玺

广告接待热线 28835396

诗评

时代需要的精神存在

易军

——刘克胤四言诗的当代意义阐释

在汉语诗歌谱系中,四言诗自《诗经》的集体吟唱、曹操《观沧海》的苍茫悲慨之后,便随汉语音节与情感日益丰富而逐渐退隐,几成“绝学”。在当代,四言诗既缺乏创作群体的自觉探索,亦鲜见读者市场的有效呼应,学院派研究多止步于文本考据。正是在此背景下,刘克胤历时一载,以其160首蔚为大观的创作,陡然打破这种静默。其在最极致的形式限制中,探寻精神表达最磅礴的自由,旨在证明:四言诗这一被时间淹没的“古鼎”,依然能够沸腾今日世界的纷繁万象。

青铜钟声:在断裂处重建诗歌的公共性纽带

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困境已是学界共识,但坦率而言,诗歌的危机并非诗的消亡,而是诗与公共生活的精神失联。

中国现代诗自诞生之初,便以“反传统”为旗帜,在形式革新与内容表达上展开系列探索。朦胧诗派以“象征”“隐喻”为艺术手段,承载对人性的深度思考,使现代诗在特定历史时期承担了重要的公共话语功能。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现代诗逐渐陷入“先锋性”迷思,对语言“陌生化”的过度追求,表达“私密性”的极端强化,乃至“下半身写作”以“反诗意”姿态解构传统审美,不仅消解了诗歌的艺术本质,更彻底割裂了诗歌与公共生活的精神联结。

与现代诗的“先锋性”迷思形成对照,旧体诗创作则陷入“复古僵化”与“创新失度”的二元困境。前者在语言意象上“只见古人不见今”,因与公共生活疏离,审美趣味日趋小众,价值表达日益内倾,既无法回应时代精神困惑,更难以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后者急于实现旧体诗的“现代化转型”,盲目植入当代元素,漠视旧体诗深厚的文化积淀,诸如“手机设个振动档,免得旁人受骚扰”之类的表达,完全丧失了诗歌的语言美感与意境和谐,非但未能推动真正的现代化,反而加剧了旧体诗的边缘化。

无论是现代诗的“先锋性”迷思,还是旧体诗的“二元困境”,其症结在于诗歌作为公共话语载体的功能失效。学界在探讨这一危机时,往往将原因归结于读者审美趣味的变迁、传播媒介的转型等外部因素。不可否认,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诗歌与公众的疏离,但表象背后潜藏的根本问题,是诗歌精神主体的缺席。诗歌作为承载精神价值的文学样式,其公共性的生成必然以清晰的精神主体为前提。当诗歌不再提供稳定的价值指引,无法表达普遍的精神诉求时,被公众抛弃便成为一种必然结果。

如何在坚守诗歌艺术本质的基础上,重建诗歌与公共生活的精神联结,成为当代诗歌发展必须破解的核心命题。就旧体诗而言,其公共性重建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传统形制”与“当代经验”的有效对接,能否契合当代读者的期待视野。

刘克胤的四言诗创作,以独特的实践给出了答案:传统诗体只要完成“创造性转化”,依然能够承载当代经验,重建诗歌的公共性。其作品对基层民生、官场生态、现代文明困境的深度关注,对当代意象的诗性编码,使传统士大夫的“家国之志”在都市语境中转化为多元现代性关怀,为诗歌公共性的重建提供了宝贵经验。

可以说,刘克胤的160首四言诗,如一口被重新敲响的青铜洪钟——不是出土文物那沉闷的音响,而是属于诗歌公共性断裂处的精神象征,以古典诗体的文化质感,震醒着当下的时代诗群。

形式起义:四言诗的当代创造性转化

刘克胤的创作成就,核心在于他

让四言诗这一近乎进入文学博物馆的古老文体,重新获得了书写当代生活的能力。其创作既延续了《诗经》以降的古典文脉,又以鲜明的现代意识完成了古典形制的创造性转化。

在诗词创作的形式选择中,刘克胤无疑挑选了一幅最沉重的“镣铐”。四言诗的极度简省特性,要求创作者进行最苛刻的语言提纯与情感压缩,而在实现这一艺术追求的同时,还需构建现代审美张力。这种看似“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对抗性,反而激发出刘克胤的创作潜能,使其展开了一场多维度的“诗学实验”。

(一) 语汇体系的古今贯通

四言诗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体,具有语言古朴凝练、节奏明快、意境典雅的美学特质。刘克胤深谙其精髓,在创作中既保留了古典四言诗的语言韵味,又巧妙融入当代语汇,构建了“文言语法为骨、白话词汇为肉、当代意象为血”的语汇体系,实现了语言的古今贯通,为古典诗体的现代转化奠定了基础。其语汇建构严格遵循“新韵、新语、新事”原则,既避免了复古僵化一路的晦涩,又摆脱了创新失度一路的生硬,为旧体诗的语汇创新提供了范本。一方面,广泛汲取《诗经》《楚辞》及汉魏乐府等古典文学中的经典词汇,以简洁凝练的方式营造典雅的审美意境,如《携游》中“岁序”“甲辰”“杪秋”等古典词汇的运用;另一方面,大胆将“微信”“光头”“房产”等当代语汇融入创作,赋予古老诗体强烈的时代气息。值得注意的是,其语言创新并非简单的“古典+现代”拼接,而是在深入理解古典诗体语言特质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句式节奏、优化词汇搭配等方式,实现古语与时代的和谐统一,使当代语汇与古典语汇形成互补,既增强了诗歌的时代感,又保留了诗歌的审美韵味。

(二) 诗学内涵的当代扩容

四言诗的简洁形式决定了其不适合长篇铺陈,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承载深刻内涵。刘克胤的四言诗充满“哲思的瞬间”,如《身世》中“人寰浩漫,歌想世”对存在本质的叩问,《弃饮》中“意倦尽欢,何以求醉”对现代人焦虑状态的体察,《空村》中“路迢迢乡村,环顾无人”对城市文明进步下乡村困境的喟叹。这种创作实践使《诗大序》中“诗言志”的传统内涵得到当代扩容——从传统的忠君爱国、感时伤怀,拓展为对现代公民社会的理性思考,对人类普遍处境的深层关切,对个体尊严与价值原则的坚守等公共性话题,使诗歌摆脱了当下诸多鸡汤文学的廉价抒情。

在传统表现手法的运用上,刘克胤同样实现了当代转化。《翔翎》中“一步一摇,极尽斯文”以猴喻人,讽刺现代人的虚伪与功利;《菩萨》中“是非非非,不费一唾。万物生生,但识香火”,对在位不作为却独享利益者进行画像,使传统比兴手法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生;《村墟》采用“现状—回忆—担忧”的三段式叙事结构,情感细腻地接近现代短篇小说水准;《杀牛》中“黑布一块,蒙蔽双眼。锁套四条,遂使就范。众汉倒拉,力唯用满。轰然倒地,山岳惊颤”,通过动作、声音、场景的连贯书写,构建出极具张力的叙事场面,展现出对现代叙事技巧的吸纳,打破了中国传统旧体诗叙事单一化、场景化的局限。

(三) 意象系统的古今嫁接

刘克胤在诗歌意象上进行大胆创新,通过现代元素的融入与转化,实现古典与现代时空的巧妙嫁接。在传统意象的现代重构方面,《冬至》中的“梅”已不再是王安石笔下“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的高洁象征,也非陆游诗中“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孤芳自赏,而成为对抗都市异化的精神图腾——“雪花飘落,无计寻梅。性起吟哦,直打心扉。”“酒”的意象更呈现出丰富的现代性内涵:《致仕》中“有酒浅斟,醉彼天香”的酒是逸

生活的伴侣;《嘉会》中“梦酌空杯,醉以短章”的酒是天各一方的惆怅;《夜宴》中“孰先言醉,齿齿还羞”的酒则成为社交场域的假面。这种意象的多义性拓展,使传统意象能够承载现代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精神状态。在现代意象的古典转化方面,诗人对“都市意象”进行引入与转化,实现古典形制与当代经验的对接。《访梅》中“灯火葳蕤”的都市夜景与“疏影相随”的自然意象形成对立,构建出“自然—都市”的二元隐喻;《歌厅》中“朱唇微启,闻之如血”的现代场景,通过“朱唇”这一古典意象的投射,完成对都市欲望的诗意批判。刘克胤的意象系统既扎根于古典文化传统,又紧扣当代生活现实。传统意象的当代重构,让古典文化精髓得以传承;现代意象的古典转化,让古典诗体能够嵌入当代现实内容。这种建构方式为古典诗体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核心支撑,使其诗歌在古典韵味与时代精神之间实现平衡。

精神返场:都市士大夫诗学人格的建构

如果仅在形式层面进行古今对照的艺术玩味,刘克胤的多维度诗学实验或将流于技巧展示。形式的革新终究是手段,其核心目的在于诗歌公共性的重建。当代诗歌公共性危机的根源,在于精神主体的缺席——诗歌失去了与时代对话的精神立场,自然也就失去了被公众倾听的理由。刘克胤提出的“都市士大夫精神”,正是对这一精神缺席的回应。

这种“都市士大夫精神”并非简单的复古怀旧,而是在现代都市文明语境下,对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重构,是传统士大夫精神与当代都市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其核心要义在于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伦理,转化为都市语境下的批判自觉、伦理坚守与公共关怀。当诗人以“都市士大夫”的身份介入现实,其诗歌便不再是纯粹的个人情感表达,而是承载公共理想、回应公共关切的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主体的重建,为诗歌公共性的生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让诗歌重新获得与时代对话的能力,重新拥有引发公众共鸣的精神内核,也为诗歌重返公共生活打开了通道。

正是基于这种精神建构,刘克胤的诗歌成为可被公众识别、信赖并追随的价值主体,形成了具有鲜明个人特质的诗学人格。

(一) 理性的批判精神

批判精神是刘克胤诗学人格的重要支点,其批判对象涵盖当代社会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批判体系。刘克胤的诗歌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冷静理性的批判意识。如同手持四言诗手术刀的病理学家,他以冷峻的笔触划开时代的表皮,剖析权力异化、生态破坏、城市化进程弊端、人性异化与社会浮躁等现实问题。其批判并非情绪宣泄或空洞口号,而是建立在深刻观察与理性思考基础上的精准剖析。

这种批判能力的形成,与诗人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21岁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理工背景,赋予其严谨的逻辑思维与敏锐的观察能力;早年创作现代诗,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并出版多部现代诗诗集,为其奠定了扎实的诗歌创作功底;年过不惑转涉旧体诗后,凭借独特风格迅速崭露头角,被蔡世平誉为“五言刘”;而出身农村、入职央企后又长期扎根基层的从政经历,更使其获得了深厚的素材积累与思想支撑。“官员诗人”的身份,让他既能站在公共视角观察社会,又能以诗人的敏感捕捉个体的情感与苦难。

基于此,他以白描手法记录“上天无道,二子遭殃。同年残废,苦痛在床”的民生困境,以尖锐笔触批判“食彼俸禄,满口陈腔。一身自保,无异螭螂”的官场弊病,以戏谑口吻嘲讽“苦

不习文,亦不习耕……金丝眼镜,一脸阳春”的投机富商。代表作《一官》中“应声诺诺,笑面藏奸。磨刀霍霍,铁心如磐。敲骨作薪,吸血养膏”,仅用二十四字便构建了完整的权力异化图谱,精准击中了当代社会的核心痛点。当一首诗歌直面现实,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真相时,他便获得了被公众倾听的资格。

(二) 清晰的价值坚守

批判的意义在于打破旧有不合理的秩序,而坚守的价值则在于构建新的精神坐标。如果诗歌仅停留在否定与破坏的层面,无法提供积极的价值指引,最终只会沦为抱怨的集合,难以形成持久的公共影响力。刘克胤的批判始终与清晰的价值坚守相伴相生,其坚守内容涵盖人格操守、精神追求、价值导向等多个层面,形成了完整的坚守体系。

《本色》中“不留长发,无损青春。延年及壮,光头示人。熔金植骨,画竹为魂。深居闹市,窃喜离群”,以“光头”这一独特的外在符号,宣示了对独立人格的坚守——本质上是不被世俗潮流裹挟、坚守自我本真的精神表率。刘克胤所坚守的,并非僵化的传统教条,而是经过当代语境转化、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正直、诚信、仁爱、自尊等,使其成为具有当代生命力的精神资源。《种竹》中“生唯正直,长幼虚心。死犹抱节,世代坚贞”,将竹子的“气节”与当代人所需的人格操守相结合;《君子》中“非理不言,非法不从。盗泉不饮,恶木不通”,则为当代人树立了清晰的道德标杆。

这些诗句看似是对传统道德律令的重申,却在价值混乱、信仰缺失的当代语境中,成为稀缺而珍贵的精神坐标,为读者提供了精神庇护。这种坚守并非个人化的选择,而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基因的精神传承。通过对这些文化基因的当代激活,刘克胤既唤醒了读者集体无意识中的文化认同,也恢复了诗歌作为公共价值锚点的稳定功能。

(三) 深沉的悲悯情怀与公共关怀

以批判精神与价值坚守为核心支点,刘克胤四言诗的都市士大夫精神谱系进一步拓展出悲悯情怀与公共关怀两个重要维度。悲悯情怀是诗歌的“温度”,体现诗人对生命的敬畏与对民生的牵挂;公共关怀是诗歌的“宽度”,正是悲悯情怀的升华,体现诗人对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关注。二者共同构成了都市士大夫精神的人文底色,也使诗歌更具感染力与公共性。

刘克胤的诗歌充满人文温度。《悯鸟》中,他既批判了城市化进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又以“可怜”一词定性鸟的遭遇,在同情背后蕴含着对人类活动过度扩张的深刻反思。《家父》中“思忆家父,一生素朴。敬天敬地,神仙莫辱。年近七旬,不离田土。患女相劝,偶坐轮椅。但言身健,宁为废物。闲坐难安,日久自苦”,以朴实语言勾勒出父亲勤劳朴素的一生,既流露出深切的思念之情,又凸显出天下父母的晚年困境,充满悲悯情怀。《中年》中“白驹其速,时莫私循。长途奔竞,惯看风云。重轭在肩,百病莫除。有苦强忍,屏息独吞”,精准捕捉当代中年人的生存压力与精神困境,极易引发读者共鸣。

公共关怀是刘克胤悲悯情怀的自然延伸。钱穆曾指出,士大夫“以身许国”的核心在于对公共利益的担当,刘克胤的诗歌正是这种担当的体现。《铁汉》一诗对陈行甲的致敬,本质上是对公共价值的推崇;《绕行》一诗写“狼虎出没,大道因废。时人闻之,能不理睬。委曲求全,劳心戒备。是赖以何,寡言为贵。日月滔滔,春秋改岁。山水长情,自知真味”,既批判了社会规则失序的现实,又以委婉口吻倡导人们坚守初心,体现了强烈的公共关怀。

概言之,批判、坚守、悲悯构成了刘克胤四言诗都市士大夫精神的三角架构,三者相互支撑,辩证统一。批判

因坚守而具有力量,没有对正义的坚守,批判便会沦为愤世嫉俗;坚守因批判而保持清醒,没有对现实的批判,坚守便会沦为盲目乐观;悲悯使批判与坚守获得温度,没有悲悯的批判是冷酷的,没有悲悯的坚守是僵硬的。

从功能维度来看,三者各司其职:批判精神为诗歌提供了介入现实的锐利切口,价值坚守为诗歌奠定了维系公共性的牢固基石,悲悯情怀则为诗歌搭建了连接公众的共情机制。这种相互支撑、各司其职的关系,丰富了都市士大夫精神的内涵谱系,也使刘克胤的诗歌能够跨越个体经验的局限,成为与公众产生联结的共同精神财富。

诗学启示:诗歌公共性的重建路径

当代诗歌公共性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时代议题的回避,未能与当代公共生活形成有效互动。在当下语境中,如何重新获得介入公共生活的能力,是当代诗人必须回应的首要问题。刘克胤以诗人的敏感捕捉时代痛点,以士大夫的担当做出价值判断,以知识分子的理性进行社会批判,以普通人的悲悯联结读者情感,其诗歌中承载的都市士大夫精神,填补了当代诗歌精神内核的空白,为诗歌创作注入了灵魂与生命力,也为当代诗歌公共性建设提供了重要示范。

需要明确的是,诗歌公共性的重建并非单纯的传播渠道拓展,其核心在于实现从文本到现实的贯通,让诗歌能够真正介入公共生活,引发公共共鸣,凝聚公共价值,成为公共话语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当诗歌触动读者心灵、引发普遍认同,才能实现广泛传播与公共影响。

换言之,诗歌要成为承载公共性的精神器皿,必须打开三重门:一是议题之门,让诗歌成为引发社会思考的契机;二是价值之门,让诗歌成为照亮公众精神世界的光源;三是共情之门,让诗歌在特定节点成为接通集体情感的纽带。这正是刘克胤“都市士大夫精神”为当代诗歌带来的重要启示。

刘克胤诗学实践的另一重智慧,在于他让这种精神通过诗歌的艺术形式真正抵达公众,揭示了旧体诗在当代的三种可能性。其一,形式的可能性——让古老的诗体工具解决崭新的时代问题;其二,道路的可能性——以诗学人格为被困困于“复古僵化”与“创新失度”之间的旧体诗创作开辟第三条道路;其三,传播的可能性——诗歌不仅要实现美学上的自足,更要预设与社会衔接的接口,从书斋中的装饰性文本,转变为公共生活的精神工具。

在这个意义上,刘克胤的创作不仅是一次成功的诗学实验,更是一次公共精神的诗性复兴。他让我们看到,诗歌重返公共生活的道路,不在于迎合时代潮流,而在于回归精神的本源,回归那个曾经让《诗经》成为民族心声、让杜甫成为“诗史”、让士大夫精神照亮千年文明的精神本源。

《四切》中“诗恨叨叨,情苦难已”,恰是诗人创作心境的写照:“叨叨”并非无病呻吟,而是知识分子必须言说的时代责任;“难已”并非个人感绪,而是对时代疼痛的集体感应。刘克胤以160首四言诗,在古典与现代、个人与公共、批判与建设的张力之间,架起了一座精神的桥梁。

当最后的诗页合上,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古鼎般的余音,更是一种时代召唤——让诗歌回到它最初也是最该在的位置: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是多数人的精神必需品;不是时代的装饰画,而是时代的怦然心跳。

因此,《风语》这部诗集不仅是一组四言诗作的集结,更是一份诗歌公共性复兴的宣言。它提醒我们:诗歌想要被时代倾听,先要成为值得倾听的精神存在;想要影响时代,先要成为时代所需要的精神力量。